

忠實的工人和傑出的學者： 大人文學科與知識倫理

〔美國〕Chad Wellmon（撰） 林太平（譯）

【提要】 隨著數字和計算人文學的出現，學者們正懷著新的緊迫感討論人文學科意義何在。許多人提出，數字數據過量前所未見，並呼籲新的措施、實踐及認識論。將這些主張放在羅琳·達斯頓稱為“綱要實踐”的較長歷史背景下考察，19世紀晚期德國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以及他擔任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時發起並領導的項目特別值得關注。蒙森發明了“大人文學科”以及其同時代人稱為“工業化”模式的學術研究，一種有助於創造新的現代學術人格和知識倫理的模式。

【關鍵詞】 數字人文 大人文 蒙森 尼采 學者人格

【中圖分類號】 I0-05;G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3 - 0140 - 14

一、數字時代的知識

在過去的二十年，關於人文探索目的與實踐的長期爭論，其焦點已經發生變化，成為一場關於數字時代人文學科未卜命運的爭論。隨著數字和計算人文的出現，學者們正懷著新的緊迫感討論人文學科意義何在，人文研究意味著什麼。數字和人文學科都是內涵豐富的概念，有複雜難解的歷史。數字人文如果想要與二者有任何的相關性，都需要根據這兩種歷史來理解。

史學家大衛·阿米蒂奇和喬·古爾迪最近在《歷史宣言》裡讚頌“大數據”的出現是一種機遇，可以復興大問題、大歷史和長時段，並因此令歷史再次變得重要。^①但並非所有史學家都對此充滿信心，這一宣言在史學家中反彈強烈。德博拉·科恩和彼得·曼德勒稱，阿米蒂奇和古爾迪“不負責的概括”相當於未經證實便斷言“長期”和更多數據必然涉及更重大和更有意義的歷史。^②阿米蒂奇和古爾迪的回應則貶其為學術界“特有的制度性短期主義”，若沒有更多數據和收集數據所需的實踐活動，就沒有“長時段”。儘管對“大數據”的認識論前景意見不一，阿米蒂奇和古爾迪同其批評者對“大數據”歡呼或質疑時，都仿佛是面對一種沒有歷史的現象。

圍繞《歷史宣言》的爭論迴響著文學學者中類似的辯論。辯論的一方馬修·L. 喬克斯的主張與阿米蒂奇和古爾迪類似，認為隨著大量數字文本集的改進，包括 Hathi Trust 這樣的非商業合作

夥伴和 ECCO 這樣的營利性資料庫，人文學者能夠提出前所未有的問題並發展新的實踐活動。這迫在眉睫的人文探索的“革命”將要求“新的方法，對研究對象的新思考方式”——一種全新的認識論。喬克斯鼓勵僅以“高度軼事風格的主觀方法”武裝的人文學者採納科學的現成方法和認識論。但他對科學的理解是有限的：“科學的目的……是對某些現象形成盡可能好的解釋。這是通過小心、全面地搜集證據而做到的。我們認為，達到的結論和收集的證據水平一致。”^③他認為是科學，而非個體的科學家，根據事先形成的假設全面搜集證據並給出解釋。

辯論的另一方嘲弄了數字人文對數據、圖表和數字的癡迷，這些東西並未傳遞任何我們尚未瞭解之事，甚至將思考任務委託給計算機及其算法。但數字人文的多數批評者沒有討論學者實際用數字工具做了什麼——彙編、編輯、標記、注釋、構思，以及簡單地將印刷內容轉換為數字檔案。相反，他們關注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創始人弗蘭克·莫雷蒂等學者的浮華主張，還有他所稱的“遠讀”（distant reading），即利用計算和定量方法研究大量文本。亞當·基爾希最近在論述數字人文對英文系的毒害時認為，莫雷蒂等學者“對人文學科和科學做了錯誤類比”。

不過基爾希的論文《科技正在接管英文系》並非只關注數字人文，而是關於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文學科，是他對人文學科應該是何面貌的看法。他寫道，數字人文的問題在於他們背離“人文主義工作的本質”：“人文主義思維並非通過會產生結果的實驗進行；它事關思維實驗，由藝術和歷史作品引發，擴展人之理解與同情的範圍……這就是為何最好的人文主義學術研究是創造性的，同詩歌和小說更親近，而非化學或物理；雖然知識不可或缺，但它依賴的並非一套知識，而是學者的想像力和現實感。”^④基爾希在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建立了清晰的邊界，他筆下的人文學科誕生於創造性的、並無科技裝飾的主觀意志，而科學則束縛於一種機械的、程序化的客觀方法，權威正來自其控制主觀性的能力。但基爾希的人文學科和喬克斯的科學同樣單一。

目前正在發動對數字時代人文學科的論戰，而歷史累積的海量文本已經可以作為數字文獻供人使用。人文學科的數據和自然科學、物理學、社會科學一樣豐富，面對過量的材料，學者已經開始反思或擔憂人文探索的實踐和目的。如果人文學者眼下並未就自己的未卜前途而爭論，基爾希等評論家對數字人文的擔憂就極有可能不會獲得這樣的吸引力。數據氾濫的體驗通常伴隨學術焦慮，部分焦慮在於要知道的事兒太多，數字化只是惡化了這個問題，加劇了隨之而來的焦慮。但正如羅琳·達斯頓所言，數字化“只是讓數據有形、可見、可得、可複製的一系列方法中最近的一種”。^⑤收集、彙編、保存、闡釋大批數據是有歷史的，數世紀以來，這種收集數據和證據的實踐活動對人文學科至關重要。就算所謂的“大數據”時代帶來了新的規模和速度，但並不必然引入全新的認識論或實踐活動。

人文學者對數據感到不適，部分原因是人文學科的歷史基本上被描述為阿布莱希特·丟勒的版畫《書房裡的聖傑羅姆》（1514）中的場景：一個孤獨的學者埋首書堆獨自勞作，偶有獅狗相伴。但是，人文學科在集體項目上也有很長的歷史。18世紀早期的德國，約翰·澤德勒編輯出版了歐洲歷史上最大、涵蓋最廣的百科全書之一；1751年到1772年間，德尼·狄德羅和讓·勒朗·達朗貝爾出版了28卷的《百科全書》；那個世紀最後幾十年裡，一系列德國百科全書項目協調了數十人的學術工作。^⑥人文學科的歷史並非只是孤單的闡釋行為，也是合作實踐的歷史。

魯迪格·馮·布魯赫和達斯頓指出，在德國，至少直到19世紀後三分之一，自然科學和物理學模仿了語文學等學科的許多方法和實踐，語文學在數據發掘、觀測者協調以及信息收集與編纂方面都有領先技術。19世紀晚期，普魯士科學院在以項目為基礎的、大規模合作性學術研究中

開創了新形式。這些項目不僅挑戰了方法、證據和闡釋的範式，也挑戰了有關人文科學應如何進行合法的學術探索的認知和倫理規範。在歷史學家兼古典學者、諾貝爾獎獲得者特奧多爾·蒙森的領導下（1873 到 1895 年他擔任學院常務院長），學院將一種跨越數十年收集海量材料、管理數千名學者和工人、將腦力勞動分工組織的學術研究制度化，蒙森及其同時代人稱之為“學術大工廠”。因而，在“大科學”和“大數據”出現之前就有了大人文學科。

蒙森的工業化學術模式成了尖刻批評的目標，在許多 19 世紀晚期的德國學者看來，這也是人文主義知識危機迫在眉睫的信號。圍繞“大人文學科”的爭論令統治德國學術界近一個世紀的認識論和倫理預設清晰可見，也預見了文化和社會科學與自然和物理科學之間的種種分界：個體探索對合作探索；闡釋探索對描述性或解釋性探索；等等。19 世紀晚期大人文學科在德國的出現只是收集和編纂實踐史上的一章。過去十年裡，學者們已對此進行了詳盡論述，但我的關注點在其倫理理念。“大人文學科”的出現不只牽涉對學者如何建立權威知識的不同理解，即關於證據、事實、批判和論點，還涉及關於學者應是怎樣的人的不同看法。

在組織歷時數十年的羅馬銘文編纂時，蒙森將一種新型的現代學術研究制度化，這對人文探索有深遠的認識論、政治和倫理的影響。“大人文學科”的出現挑戰了一百多年來對德國學術和思想史至關重要的理念。這場已被忘懷的辯論強烈的道德本質——關於知識的合法目的及學者的品格——與關於數字時代知識的狀況與目的的辯論產生了共鳴。在我們的時代，當學者體驗到過量的數據，遭遇新的證據形式時，往往會回到有關學術實踐狀況的問題上，思考其規範、精神和目的。因此，考慮到收集並組織數據以彰顯其意義的歷史實踐，目前的討論可以看作是一段更久遠歷史——支配人文主義探索和學術研究的倫理及認識論規範的歷史的一部分。在這些歷史條件下考慮數字問題，有助於我們將實踐理論化——例如搜索技術、資料庫建立、或綜合處理的實踐。

19 世紀晚期德國關於“大數據”的爭論也是當時有關現代學術研究的更大範圍論爭的一部分，到 20 世紀初，馬克斯·韋伯認為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⑦韋伯的聲明標誌了統一的學術研究夢想的終結。而蒙森儘管被認為對知識持現代傾向，卻依然堅持這個夢想，並以其立場促進了人文學科和現代學者倫理人格的重新發明。

二、集體的學術研究

1844 到 1845 年，蒙森靠著研究獎金在意大利旅行時只是一名青年學者，沒有穩定的學術職位，每天早晨在圖書館、博物館或檔案館研讀羅馬手稿。在離開德國前往義大利之前，他已計畫編輯一部克里斯蒂安·豪博德關於羅馬法律淵源的著作的新版本。^⑧然而在抵達羅馬之前他就改了主意，決定搜集“法律碑文編為史上最詳盡、嚴謹的集子”。^⑨在羅馬的圖書館和檔案館僅幾個月後他就意識到，他計畫找到、彙編、校勘、編輯並最終出版羅馬帝國所有拉丁銘文，這需要一種不同的學術研究。最初，他同奧托·雅恩一起向普魯士學院申請 2 萬塔勒銀幣，來做一個銘文合作項目。^⑩1847 年，蒙森向學院提交了一份可被視為首個“大人文學科”項目申請書的《〈拉丁銘文全集〉/CIL 備忘錄》。^⑪蒙森在其中清楚表明，這一項目會較之前申請的項目更為“影響廣泛、花費高昂”。^⑫同科學院的談判持續數年，因為有幾位領導成員、尤其是語文學家奧古斯特·伯克，擔心“項目的巨大規模”，疑心是否有任何一位學者能夠保持“整體視野”。^⑬

蒙森的銘文項目並非首個此類項目。從 1825 到 1877 年，伯克領導編纂《希臘銘文全集（CIG）》，彙編了公開的希臘銘文，從而使金石學成為古代文化研究的決定性方法。^⑭雖然伯克

最初提議收集未出版的銘文，但為監督項目而設的委員會否決了派出學者從石頭上收集新銘文的意見，^⑮決定只編纂那些從手稿或書籍中零星收集的銘文，並按照“連貫的”計畫組織它們。^⑯

伯克和蒙森的項目都有大規模視野和合作性人文主義學術研究。在伯克 1815 年最初的 CIG 意見書裡，他力圖收集數千份“散落各處”、“殘缺不全”的銘文並使之可以使用。^⑰他認識到這樣的全面收集需要不同類型的腦力勞動，對研究院比對大學更為合宜，因為前者專心搞研究，後者則有研究與教學的雙重任務。他認為，先進的學院不應僅僅是個讓學者私下湊在一起閒聊各自學術工作的場所，而應該支持和組織那些“由於學者能力不足或本就不能單獨完成而令個體[學者]無法獨自承擔”的項目，^⑱這樣的項目需要依託有國家支持的“團體”。大學是個體學者的機構，學院則是學者集體的機構，他們為“整體的”的項目協力工作。學院資助 CIG，引進了組織學術實踐的新方式。這要求那些在傳統上只是單獨授課、提交報告並撰寫論文的成員，作為整體一起工作。學院設立了委員會監督 CIG，委員會成員要每週碰頭，提交書面報告，說明為“共同工作”而達成的進展。委員會為圍繞著“集體經驗主義”而組織起來的新型學院學術鋪平了道路，這種類型的探索協調、彙編、整合來自“跨時空分佈”的觀察者的稿件和材料。

三、檔案的認識論與集體倫理

蒙森 1847 年的建議書可以看做一份對伯克項目的起訴書，其中清楚陳述了將指導他數十年 CIL 工作的認識論原則：批判、整體和真實。“CIL 的目的是將所有拉丁銘文納入一個文集，以便便利的順序彙集，在剔除不真實的石碑後，批判地、精確地複製於文本中，並有大量的各種選集和精確索引以便使用。”^⑲伯克的 CIG 受限於文學傳統，蒙森則尋求將 CIL 建立在解剖和肉眼檢查上，越來越精確的材料將成為更好的證據。

1852 年蒙森出版了《那不勒斯王國的拉丁銘文》，該書讓哪怕最“遲鈍”的觀察者也信服蒙森的項目可行且有價值，因此在 1854 年，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同意六年共資助 1.2 萬塔勒。1858 年，蒙森被邀請加入學院，並獲得了項目的唯一領導權。在就職演講中，蒙森將 CIL 的原則更廣泛地擴展到學院中。他說建立“過去的檔案”並不只是歷史—語文學領域的目標，而是整個學院的目標。^⑳重要的是，“過去的檔案”並非理想化的知識統一，並非作為“理性的理念”的康德式整體觀念，不對應任何現實。蒙森要學者們收集得到的一切，並將其塑造為經過細緻組織、編輯和索引的印刷本，他要讓歷史數據可見、可得、可瀏覽。過去的統一不能被認定為一種觀念行為，必須彙編為檔案，這檔案是現在的基礎設施，最終面向未來的學者，它是個數據庫。

蒙森宣稱這樣的檔案是必要的，因為“所有未經深思的傳統[已然]沉默”。^㉑他追隨其導師尼布爾對文學傳統不可靠性的批判，認為承襲的傳統是“偽歷史”。^㉒因而現代歷史學家和語文學家的任務是對“歷史的不完整情況”進行“編纂和分類”，^㉓將過去的“確定無疑的遺跡”整編為可以信賴的形式。^㉔蒙森重申自己最初的 CIL 建議書的意見，認為這樣的檔案應有三個基本特徵：建立在分立的事實、而非連貫的故事之上；真實可靠；全面。蒙森並未將檔案限於古代銘文，但 CIL 示範了他認為能夠實現上述要求的學術實踐。

（一）何為史實

蒙森寫道，真正的“過去的檔案”必須建立在“事實的邏輯”而非古代作者的文學記述之上。^㉕尼布爾這樣的學者在關於源本批判的開創性工作中只依賴文學或文本來源，例如信件、演講和敘述。蒙森認為“書”不是充分的證據形式，^㉖因為其敘述的形式縱容闡釋性插入和作者介

入，隨著時間流逝，文學證據不可避免地被文本傳輸中的遺漏、前後矛盾和錯誤所損害。他就曾嚴厲斥責約翰·巴霍芬未能分辨什麼是古羅馬語言、習俗、宗教和法律制度中“確實”能瞭解的部分，什麼是“後來學者和詩人對愚蠢傳奇的嘮叨”。^②對蒙森而言，“傳統是通過礦石還是大理石、羊皮卷還是紙張傳播”，^③並無分別。他把傳統文學來源的敘述的、歷時的特點同過去“古跡”所具有的共時的、物體的特質並置，後者是其時代更“即時”的證人。“事實”所具有的實體性——刻在石頭上的銘文或金屬壓制的硬幣——更即時地將物品置於過去並賦予其指示性的品質。根據完整和真實原則彙編組合，這些獨立的“事實”就成為一致的、權威的檔案。

蒙森關於共時性索引證據形式的理念部分吸收了古文物學研究的較早形式，後者從文藝復興和 18 世紀起就指導學者編纂羅馬物品的大型目錄。但蒙森認為任何真實的檔案必須是完整的。例如，他設計 CIL 不只是為了便利任何單個銘文的闡釋，更要緊的是幫學者們發現和揭示數萬銘文之間的關係，銘文證據力量和潛在意義的前提是一組全面事實包含的可能性。在此意義上，蒙森在 CIL 裡部分實現的“檔案”觀念，從根本上損壞了傳統文學檔案的線性。蒙森並沒有採取線性閱讀的句法來組織證據，而是想像了一個多維度的、更具空間感而非時間性的檔案。他和編輯同事們據此安排銘文，CIL 的每一卷都是根據發現銘文的地區按地理位置組織的。

（二）何為真實

蒙森設計了一套體系，將金石學發展為一門有著自身精細實踐的科學。無法從原本得到紙質拓本時，它會依靠現代語文學批評方法來比較銘文的各種版本。^④語料的“真實性”建立在三個因素之上，按可靠性高低順序排列：石碑本身，手稿集，文學傳統。銘文的收集和編輯者已經同贗品或來源不明的銘文鬥爭了幾個世紀。如果石碑上有銘文，蒙森堅持要有一位見證人做拓本，並充分記述周圍環境。這種“屍檢法”是用以檢驗銘文真實性的標準。19 世紀以前，這種解剖傳統主要同個體學者相關聯，但蒙森將這做法擴大到集體觀測事業，規模的變化要求必須執行一系列步驟和程序。由學者、學生和合作者組成的大型人員網絡踏遍歐洲，收集過去的“可見證物”。

蒙森不但自己不知疲倦地投入編輯工作，還監督著自願的助手網絡在歐洲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搜索銘文。如果銘文只有文本形式、手稿或印刷文集、或在傳統敘事中被引用，他會堅持這些證據必須接受現代語言文獻學的徹底審查。在蒙森心目中，對銘文的“批判性”收集的榜樣是 19 世紀德國語文學家，如拉赫曼，後者依據不同手稿編輯了一部中世紀《尼伯龍根之歌》集。拉赫曼認為，該文集是剔除了所有舛誤和抄寫錯誤的“原始的”和“真實的”文本。^⑤這些項目必須面對前所未見的浩瀚文本，因此要用複雜的方法“處理圖書館裡堆積如山的海量資料”。^⑥

傳統的銘文集無法信任，因為文集編纂者的方法和實踐都不可靠，蒙森曾用“匆忙”和“粗心”來形容。檔案的真實性與道德倫理不可分。Wissenschaftlichkeit（學術性，科學性）這個詞指涉的是理想的現代學者的素質、德行和品格。蒙森認為，像檔案這種“所有銘文的集合”要求“徹底窮盡的研究”，^⑦優秀的語文學家或歷史學家不應該問這個或那個文件或某個物品是否“值得”保留，而應該直接收集檔案，形成“富饒的土地”，未來的學者可以“開墾為可耕地”。不同於韋伯對現代學術的命運以及目的和因果性觀念的擔憂，蒙森極少考慮檔案的最終目的。蒙森提出，原始材料的組織必須和闡釋分開。他贊同拉赫曼關於語文學家“能夠而且必須不闡釋地編輯”的觀點。^⑧但同時，蒙森和拉赫曼一樣，也承認編纂也意味著挑選。他堅持學者只收集真實的事物，所以他們需要辨別真偽。正如批評者會指出的，這也意味著要求判斷甚至闡釋。

（三）大人文學科的長時段

在普魯士學院最初資助蒙森的 CIL、甚或伯克的 CIG 之前很久，就有了大型學術項目，其中許多項目收錄了大量目錄學信息——歷史數據。這些啟蒙時代的項目也是通常作為歷史書籍出版的早期現代項目的延伸，並與培根的努力有關，他要觀測、收集、組織從手稿和印刷本到植物和昆蟲的一切事物——事實、數據、觀測的集合。所有項目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時間和集體資源的密集需求與互不關聯的隱患之間根本性的張力。同樣的焦慮在於，有組織的項目不可避免地導致資料數量龐大，這本身就會讓人不知所措。然而這些早期項目同 CIL 之間存在著關鍵區別：早期的學者收集、校勘往往出於對知識毀滅的恐懼，而蒙森表面上關注過去，實則是為未來而收集。

蒙森的 CIL 預示，類似項目在制度、認識論和倫理上的模樣都將改變。CIL 主要由國家資助，以學院為基礎組織廣泛的勞動分工。蒙森在組織 CIL 時也將“學術大工廠”模式引進到腦力勞動中，聚焦於“對工作的功能性組織”。^④項目的一切因素和所有人員都被協調和管理起來，以產出精心編輯的古代銘文印刷卷冊，這種模式及規模的學術研究，其目標是製造產品。

到 19 世紀末，CIL 已接受超過 40 萬馬克，這來自學院得到的國家資助。蒙森做院長的頭幾年，學院預算獲得三倍增長，之後他支持了一系列大型彙編項目，改變了德國學術的國際地位和狀況。這些項目在認識論的設定上與 CIL 一致，哈爾納克認為有助於開創“團體勞動分工的時代”。^⑤就合作者數量、任務範圍及花費而言，這些項目前無古人，有些人能意識到最初目標，但大多數人未能做到。當項目因學術的極度專業化而遭到批評時，蒙森辯說它們不但是專業化的解毒劑，也是對專業化給知識帶來的“不可估量的威脅”的解毒劑。蒙森和同時代大多數德國學者一樣，依然忠於學術統一和所謂“普遍性”。^⑥儘管其先行者如伯克還在德國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及其有機整體概念的影響下，蒙森已轉向“科學的組織”，他認為這能把學者從現代大學“任意和無意義的”專業化中“解放”出來，^⑦制度化組織的科學可以滿足對統一的、完整的知識的欲望。^⑧

知識統一的新概念在 1881 年修訂學院章程時典章化了，章程稱學院會“特別”支持“必須多位學者合作活動的、在範圍、期限或開支上需要學院支持的”項目。^⑨因此，蒙森的工業化學術模式並非簡單拒絕學術理想和知識統一，而是以官僚和制度的形式搶救形而上的理想。在此意義上，這既是新人文主義項目的繼續，亦是蒙森面對現代性境況下的抉擇。保護學術及其人文主義目標的唯一方式，不是試圖壓倒現代性，而是適應其壓力和需求。這樣的制度統一，要求項目有表述得更清楚的設計、更清晰的問題意識，以及易於溝通和共用的方法論。大多數學院支持的項目都有明確的目標，而且一開始就清楚表明，這與那種目的逐漸被揭開或自己慢慢顯露的學術研究相反。學院將每個項目都置於“委員會”的指導和權威之下。19 世紀末期，德國政府開始更普遍地增加對學術的支持後，委員會和項目的數量爆炸式增長。蒙森主要不是通過研究方法，而是通過將其與系統知識作為合作性和分佈式項目的理念結合，促進了人文學術的革命。

（四）檔案倫理

對蒙森來說，理論驅動的學術探索形式有過分的主觀傾向，將學術作為工廠可以對其施加客觀的控制，但這同時也是以整體知識“喪失”為代價的。^⑩在此意義上，蒙森的“工業化學術研究”不僅挑戰了對證據和方法的認識論觀念，以及 19 世紀學術研究的組織機構，還削弱了學者藉以理解其學術研究和自身的那些理念。收集“過去的檔案”有助於創造不同的學術人格。

首先，學術的工業化模式將個體學者的重要性相對化了，如果不是降低的話。蒙森提醒同事們，學院的創建者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以一己之身代表了知識的統一，學院依然忠於這一點。萊布尼茨既非專業人員也非業餘愛好者，但卻是最後一位全能學者。然而，蒙森在一篇悼詞裡認

為現代學術專業化已令知識碎片化，令萊布尼茨成為屬於過去的人物。現代學者遭遇了太多信息，“科學，繼續無情而有力地前進。但個體勞動者與不斷向上的巨型結構[也就是科學]相比顯得越來越渺小和無關緊要”。^④無論個體學者如何努力去接受不斷膨脹的研究領域，能理解的卻越來越少，他會發現自己與作為整體的科學疏離、斷裂，無法解釋特定事實如何與知識整體相關聯。萊布尼茨式預設的和諧以及合理有序的宇宙或統一的學術，所剩下的只是理性方法、共有的實踐和維持它們的制度。因而，在學術體系內勞作的理想學者並非萊布尼茨，並非那個沉思的、孤獨的身影，而是一個腦力工人，要麼管理時間、資金和他人，要麼自己被管理。這種模式裡，學者生產知識，但自己並不被它轉變，至少並不會根據教育的人文主義傳統轉變，後者是強調個體和道德轉化的。作為工廠的學術，代表了極為不同的倫理理想。

此類大人文學科項目牽涉到對閱讀的不同觀念。蒙森及其同事們從未想要學者們在 CIL 裡一行行浸入式閱讀，相反，他們納入了複雜的資料庫索引，以利於不連貫的非線性閱讀方式。例如 1862 年的第一卷，有三個不同的索引：“辭彙索引”、“語法索引”、“物品索引”。蒙森以學院為基礎、項目為導向的學術研究同時也背離了大學模式，德國從 19 世紀初開始，大學模式就圍繞研討會組織，教師與學生在其中並肩工作。研討會的設計不只是為了生產知識或完成特定項目，而主要是為了讓學生發生轉變。威廉·馮·洪堡大學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學術作為一種教育形式，專業化學術研究造就特定類型的人。19 世紀大多數時候，學者和知識份子都認為教育是個學習和研究的過程，通過與文本的闡釋性互動轉變個體。洪堡的預設（或者制度信仰）在於，能夠通過專業化學術研究及其制度學帶來並保持這樣的轉變。教育意識形態的核心是統一和完整的，不只是關於知識，也是關於人的，學術即教育，這是個倫理工程。蒙森也同意這些理念，不過在他看來，大學研討會造就專門學者，而學院則造就“忠實的工人”。^⑤

第二，作為工業化工作的學術實踐要求個體學者具有某種特定形式的禁欲主義。蒙森的工業學術對從業者有倫理要求。有些項目持續數十年，跨越多國，涉及眾多學者，項目的規模決定了合作者被要求獻身於項目，但不能保證他們能見證或領會工作的全部領域。蒙森不像其唯心主義的前任們主張通過理智獲得整體，而要求克制自己實際欲望和智識欲望，將自己從屬於科學。

1845 年，還在勾勒拉丁銘文項目的想法時，蒙森就向雅恩吐露心跡，表示該項目大部分都將“只是機械工作”，但又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僅僅是科學的僕人；被召喚時，我不能說不”。^⑥蒙森重複了宗教使命和召喚獻身的語言，他早期與科學的關係，典型地體現了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5）中定義的“入世的禁欲”，即為了維持和組織個人在世上生活的理性體系，與僧侶和隱士“出世的禁欲”相對。^⑦哈爾納克曾讚頌蒙森勤勉盡責的學術美德，^⑧對蒙森來說，合作性的大規模學術研究是一種超越自我的方式。哈爾納克比較了新型工業化學者與 19 世紀早期學者，後者希望通過研究宏大歷史概念和觀念提升自己並因此“直面特異之事”，^⑨前者則研究學術編纂的“更低形式”，其信念在於特定之物會揭示“崇高之物”。他們收集整理越來越多的材料時，意識到對歷史現象的“完整理解”只能在新的“學術傾向”的基礎上實現，此種傾向致力於“事實材料”、“最審慎的批判”和“對大量材料觀測”的完整性。

大學科研人員和學者長期以來就因其迂腐或沉思的風格被中傷或頌揚，但蒙森的現代學術禁欲主義卻不同。他理想中的學者不是與過去交流的祭司，而是為了無法參與的未來而在當下勞作的現代工人。學術研究是一種智力勞動，學者由他在其中工作的現代勞動結構所定義。在最初申請 CIL 項目時，蒙森並不稱合作者為研究人員或學者，而是工人。同其他形式的工作一樣，學術

研究也是一種社會道德，學者在作為整體的社會中有特定的角色。學術不是天才的產物，而是努力工作的結果，是對方法的堅持和對細節的忠誠，馬克斯·韋伯稱之為“努力工作的土壤”。^④

第三，蒙森項目面向未來的特點意味著隨著研究工作規模越來越大，“個體工人的勤勉和才能”將會越來越不夠用。“組織工作”將要求越來越多的“制度性穩定”和能夠在項目創始人離世之後很久仍維持項目的結構。^⑤

最後，蒙森的“大科學”要求並培育了獨特的品德和技術。對它參與造就的人格而言，組織和管理技巧及對細節越來越精細的關注是最重要的。在蒙森領導或參與的項目內，管理決策者的光芒逐漸掩蓋了闡釋大師或有直覺力的評論家，組織者代替了天才。

（五）社會問題與檔案

大都市或大工業的出現會隨之帶來各種挑戰。蒙森承認，作為工業的學術也會面臨類似的社會轉變問題。^⑥尤其是 19 世紀後 30 年，關於語文學和歷史未來的內部學術爭論，與攪動遲來的德國工業化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爭論不可分割。和大工業一樣，“大科學”要求持續的“企業資金”。蒙森是高超的談判者，作為院長的蒙森為學院預算獲得了穩步增長的國家資助。蒙森的工業模式還需求其他非資金的國家支持。1847 年，身為青年學者在梵蒂岡圖書館做研究時，他曾抱怨薩爾蒂教授從教皇處獲得了特許權，“壟斷了教皇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全部銘文寶藏”，^⑦卻無意於任何工作。蒙森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要普魯士政府為他出頭。

“大”學術研究對資金和政府支持的權威的長期依賴，招致了更多政府和官僚對學術的控制。普魯士政府對支持並更直接控制學術有著自己的興趣，這在“阿爾托夫體系”中顯露得最為明顯，這是一個成型於 19 世紀後期的對德國教育和學術的官僚控制及資助體系，由普魯士政府高等教育部長弗雷德里希·阿爾托夫領導。蒙森認為，“科學與國家之間有深刻的內在結合”某種程度上也是造就“普魯士的偉大和德國在全球地位”的原因。^⑧而在批評者看來，學院的“大科學”則是普魯士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延伸，^⑨他們還指出，國家想要擴張科學而學院有意追隨，這對科學實踐有害。如蒙森自己所言，學術組織的工業化方法會導致學術工人體驗異化和淡漠。^⑩面對材料過量和為管理材料設計的勞動分工，學者們“不知道他們歸檔的這件東西後來如何”，他們對於“整體的命運”一無所知。蒙森管理著一個協作者網絡，這些被稱為“僱員”的人一心投入不同的專門工作，而蒙森和委員會成員們則從柏林監督材料的彙編進程。

1890 年代，蒙森和哈爾納克試圖為某些合作者設立更永久的職位——學術官員，以進一步將這些勞動結構制度化。這提升了那些教育程度很高、在領導團隊和項目的學者的地位。學術官員介於委員會和更普通的合作者和助手團隊之間。他們監督日常通信，領導材料收集和校勘工作，協調編輯過程中的手稿，並向委員會報告項目的狀況。蒙森和哈爾納克指出，需要學術勞動的新形式，因為研究型大學的結構無法支持這些項目的規模，大學是教授和學生的機構，教授要授課並進行研究，學生結束學業後便會離開，因而無法保證那些“乏味地學會的工作”不會迷失。^⑪

最後，蒙森的“大科學”使得方法成了人文和文化科學學術實踐的首要因素。考慮到工作的巨大規模和集體性質，研究方法、實踐和技術必須制度化，保證其穩定超過“個人生命的長度，以保障工作的進展”。^⑫這一點可以藉助兩種基本方法實現：無窮盡地積累資料，以及訓練“工友”。對方法的依賴體現了科學概念本身更廣泛、更漫長的轉變，其中知識的統一逐漸不再體現於科學的學術主體，而是在知識的處理過程中。個體學者只能看到下一步、下一個任務，因此他對過程和方法的信心是關鍵。沒有對方法的堅持，他就沒有動力或激勵因素完成其日常的碎片

任務。如同學院的制度那樣，方法替代了知識的統一，對方法的堅持替代了求知欲。

四、尼采對大人文學科的批判

但所有這些彙編和管理目的何在？在許多大項目開始之前，蒙森就面臨對其新型學術實踐會動搖人文主義探索根基的憂慮。首先，批評者質疑只是為未來學術收集“事實”的知識價值，並懷疑檔案收集和編纂工作是否能清爽地同理論和闡釋分開。第二，批評者認為，作為“大工廠”的學術研究將非學術利益危險地捲入了學術目的中。最後，批評者擔心“大學術”將專業學術研究從個人成長中分離，而後者被認為是人文主義學術研究的真正目的。青年學者開始做研究時，懷著對生活的真誠，以及學術研究能解決有關意義的問題的想法，但這些關切被現代學術“工廠式的狀況”逐漸轉移並最終根絕。關於學術研究目的的爭論，預示了韋伯在 1917 年的挽歌般的評論，關於“世界的意義”，學術研究已經沒什麼可教的了。蒙森促使了科學和學術同生活的割裂。

這些評論和焦慮通常被視為一種簡化的、往往是籠統的對現代學術研究及其對理想背叛的攻擊。威廉·馮·洪堡和其他唯心主義者，包括謝林、費希特和施萊爾馬赫，在世紀初列出了現代研究型大學的規範和理念，將“學術研究”標榜為新知識制度的倫理基礎，認為現代大學建立在與理性探索或學術研究的關係上，有其自身的美德、事實和制度，研究型大學裡制度化的學術研究，是一種個體完善甚至自我超越的實踐活動。19 世紀多數時候，學術研究代表知識的統一，人們會以近乎崇敬的口吻提起。與法國和英國學者不同，經過新人文主義理念培養的德國學者至少在 19 世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裡都忠於這個觀念，認為仍有統一的學術研究。

19 世紀的人們越來越懷疑學術研究在日益官僚化、高度專業化的現代形式裡還能否維持獨特而有意義的生活形式。對學術研究統一性日益喪失的信心在不同領域和學者團體中顯現出來，但最為顯明的也許是語文學和相關領域。在 19 世紀語文學的瑣細和論戰之中，學術研究和教育似乎彼此“矛盾”。蒙森的“大學術”儘管繼續了新人文主義的學術研究形式，但對 19 世紀晚期的批評者來說卻是學術研究幾十年衰落的最低點。像蒙森那樣用“工作”和“工廠”來描述學術研究和學術生活，將學者及其志業簡化為日常的合理化的現代性，剝奪了其道德特質。如費希特形容的，學術生涯被貶低為平常工作而非天職。^⑤蒙森“大學術”的勞動分工非常令人不安，因為這被認為是將個體學者同研究對象切割開。威廉·狄爾泰認為，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理解，不只是解釋，這需要同理心和想像力，但腦力勞動分工使之幾乎無法實現。^⑥

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國學術研究大範圍變動最早的批評者之一。尼采在備受尊崇的語文學家弗雷德里希·里敕爾門下受訓，後者也是蒙森的 CIL 合作者。1869 年，24 歲的尼采被任命為巴塞爾大學古典學教授。在蒙森忙於收集“過去的檔案”時，尼采開始診斷正在遭受“學院知識”或者“學術研究”損害的現代文化。雖然有些本領域的巨人幾十年前就對語文學偏好極度專門化而憂慮，尼采卻是將語文學病症置於學術研究更大範圍衰落之中的第一人，尤其是將語文學的厄運與現代語文學家本人聯繫起來。他指出，學術在古代不是指具體某種科學（學術研究），而是“對所有種類知識的普遍渴望”。^⑦尼采認為，19 世紀語文學家沒完沒了地爭論方法，卻模糊了最基本的真理：語文學是種生活方式，語文學家是個倫理人格。

1872 年冬天，抵達巴塞爾三年後，尼采在一系列公開講座上對現代德國大學和學術研究發出猛烈控告。他的怒火主要針對語文學家同事，指控他們忽視了自己的職責，未能讓同時代人將古代文化作為倫理資源。相反，他們收集、剖析並最終令古代失去了生命力。“語文學家因為希臘

人而毀滅並降為塵埃，這損失我們能忍受，但古代本身因為語文學家而被粉碎！”⁹⁰

儘管尖銳批評語文學的“顯微學”，尼采卻發展了自己的專業化學術研究。1871到1872年的冬天，他甚至在巴塞爾教了一門拉丁文金石學的講座課。⁹¹他為這些講座寫道，銘文“比所有手稿都更確定地”“揭示”了古代的語言、私人和公共生活以及文化。⁹²尼采是一位自覺的現代語文學家，具備專業技能和興趣，獻身於語文學的嚴謹。他讚揚老師里敕爾的《古代拉丁銘文錄》，稱之為金石學“最偉大的榜樣”，奚落伯克的CIG缺乏“必要的嚴謹”。⁹³尼采說里敕爾是他的“學術英雄”之一，將細緻的文本研究與更廣闊的文化史相結合。⁹⁴

尼采和蒙森一樣，也擔心承襲的傳統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他警告他巴塞爾的學生說，印刷文本給人一種幻象：古代文本就是現代文本。其形式本身模糊了將現代和古代分開的根本不同和距離。他因此得出結論：“我們必須學著再次學習在印刷的超級力量下忘記的一切。”⁹⁵儘管尼采通常的形象是個自我憎恨的語文學家，他對德國古籍考據的基本工作，如文本轉換問題、追溯時間帶來的變化等卻很投入。尼采評論道，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內，可獲得的材料數量“爆炸性增長”挑戰了語文學的信心：自己能夠篩選所有這些“事實”並賦予其意義。⁹⁶要做到這一點，現代批評方法和同樣重要的體現於語文學家本身及其“嚴謹”之中的現代批評傾向是必要的。

但正是這種對比和區別歷史資料的考據傳統本身的力量，可能毀掉語文學。如果語文學和歷史局限於批判，可能冒更大風險，演變為尼采在《歷史對生命的利與弊》（1874）中所稱的學術研究的古籍模式，其中“小的、受限的、衰朽的和過時的東西獲取了自已的尊嚴和可侵犯性”。古物研究面臨著所有的19世紀德國歷史論面臨的相同問題：它將過去和現在分隔得如此徹底，以至於使得真正的歷史任務——當下的倫理轉變——變得不可能。

尼采對語文學的批判在《我們語文學家》中達到頂點。雖然尼采依然自認語文學家，但他抨擊同行“沒有能力”從事有意義的學術研究，而是用“錯誤標準”和掐頭去尾的想像力毀掉了真正的學術研究，並因此毀掉了本來會受人敬仰的學術文化和可持續的實踐。⁹⁷尼采抱怨說，大多數年輕的語文學學者對待學術研究就好像它只是個現代工作。⁹⁸他們盲目下功夫，誤以為勤奮、留意細節、嚴格的禁欲主義等等蒙森頌揚的品質，必定會帶來古代的完備而全新的整理，這一新的現代類型學術人“是真正的悖論”。⁹⁹現代性的災難正在他身邊展開，他卻只是摘花、數“花瓣”。他一行行校勘、修訂、編輯手稿，但未能關注意義和方向的迫切需要。他的無知無識並非出於愚蠢，而是出於自己與知識之間不健康的關係。現代學者辛勤勞作，仿佛大學是座工廠，“每浪費一分鐘都會被懲罰”。¹⁰⁰但他對於為何如此、有何目的卻並無瞭解：“某人無知地投身於、或者被擲入某個領域。在那裡他左看右看，發現了一些新穎的好東西。但在某個時刻，沒人盯著他，他問自己：這些同我究竟有什麼關係？但到了這時候，他已經老了、習慣了一切。於是就和婚姻一樣，繼續下去。”¹⁰¹面對現代性的壓力和困惑，語文學家只是轉向了檔案。

雖然從未指名道姓，蒙森和他代表的普魯士語文學和工業風格的學術實踐一直存在於尼采的講座、信件和筆記裡。尼采寫道，亞里士多德以來，語文學家就一直收集、組織“大堆實證材料”，¹⁰²與僅僅是“從自身創造”的哲學家不同，語文學家“從書中創造”、從手稿和物質材料中創造。¹⁰³但成為真正的語文學家“更多依賴的不是大堆[材料]而是如何去做”，數據和材料的收集和編纂必須結合闡釋實踐。¹⁰⁴否則，學者只是利用古代來滿足他“對研究的渴望”或者對“知識”的渴望，與“工廠工人”每日為小小的“零件”而勞作並無區別。¹⁰⁵大學及其相關機構教學生和學

者為學術研究犧牲自己，但是為什麼？尼采問道，什麼才是今日“學術研究對我們的價值”？^⑩

19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學者和知識份子越來越恐懼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現代性所扭曲。尼采並非首個表達這種意見的人，但他最早提出德國對學術研究的信仰已敗壞，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而非真正的倫理資源。19世紀這些關於語文學的辯論不只是關於方法。它們事關語文學學術研究的目的和語文學家本人。一方面，尼采和越來越多德國學者將古代文本理解為值得仿效的生活形式的提供者和傳輸者。至少對尼采而言，古代學者要培養這些文本傳統，將其作為現代性本身所缺乏的倫理資源而固守。儘管尼采有風格化的偶像破壞行為，但某些方面他依然是傳統的仰慕希臘的德國人，對他而言，希臘式的古代是道德的烏托邦，他是沃爾夫和洪堡這一路傳統的人文主義者。他關心文本在當下的意義，即古代文本和傳統怎樣解決“我如何最好地生活”。尼采的古典主義由一種堅定的現時主義驅動。另一方面，對蒙森和哈爾納克等學者而言，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在目前的任務是，為未知的未來收集並維護檔案。那時學者或許能夠再次投入闡釋和顯示意義的人文主義天職，但是在塞滿事實的檔案完成之前，這一未來不得不延宕。人文主義天職的延宕，對現在的學者是個損失，但卻是要求犧牲的必要的損失。

五、祛魅的知識

尼采和蒙森都盡力理解並配合他們認為的知識的新時代，定義這個時代的是文化物品爆炸、智識專業化、勞動分工以及學者疏離自己的傳統、學術研究和意義。他們都以學術的名義行事，但對學術的傳統、迫切任務和未來理解卻不同。尼采擁抱闡釋的任務，蒙森則從未動搖其對彙編的執著。尼采理想中的學者是不畏艱難的釋經者（hermeneut），正揭示一個被過去的錯誤纏繞不放的當下。蒙森的理想學者是位謙遜之人，正重建由同樣的錯誤導致的四分五裂的過往。儘管他們關於理想學者的意見相左，但兩人都支持基本的語文學原則，即思想需要材料，對跨越時光傳播思想的傳統保持恰當懷疑。^⑪二人都忠於知識或者學術統一的理念。對尼采來說，這個統一只有通過倫理的自我轉變才有可能；蒙森則認為，若還有可能，只有通過無限延宕的合作項目。

19世紀晚期，德國學者和知識份子發展出了一系列轉義詞，來描述對現代時期學者命運和知識前途普遍的焦慮。哀傷的現代人，從尼采（生活與學術）和韋伯（天職與工廠）到赫爾穆特·普萊斯那（大學與大型研究中心）和格奧爾格·齊美爾（主觀的和客觀的），都將真實的、有意義的與虛假的、機械的並列。任何未來的知識都不得不跨越他們所認為的不可避免的現代性的衰落。蒙森所做的對比可能最為突出，哀傷又坦白。他區分了學院的“忠實的工人”和大學的“天才學者”。^⑫前者被不知疲倦地組織起來，極少參與真正的“學術創造”。他們只是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天才預備材料。蒙森的“忠實的工人”和“天才學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學術主體或知識人格，其基礎是各自與自己學術客體的關係。“天才學者”的智識客體，屬於創造它的個人；而學院學者的智識客體則屬於一個學術團體，並最終屬於現代人稱之為科學的永恆的、錯位的抽象。

關於語文學未來的爭論預示，甚至回應了1890年代和20世紀初許多更著名的“對方法的爭論（Methodenstreit）”，尤其是馬克斯·韋伯試圖與價值和歷史知識危機妥協的嘗試。與蒙森和尼采一樣，韋伯等學者力爭理解在面臨弗里茨·林格所謂“無限多的物體堆積”時，文化和社會科學如何能夠分辨其重要性。^⑬一些自稱實證主義者的批評家追隨尼采的懷疑主義，不僅質疑編纂如此多資料是否有價值，還質疑更多材料（或數據）是否必然意味著新的科學認識論（學術研究），數據收集能否與知識的生產截然分開？這些基本的關切，指向學術研究中的價值、主體性、

客體性、方法和意義的狀況，這些問題最終會促使人們更鮮明地區分文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1905年回頭看學術大工廠的出現時，哈爾納克也承認了其社會和倫理效應：腦力和學術勞動的分工，工作機械化，過度強調收集處理資料而非吃透資料，以及“學者變得荒謬可笑”。蒙森視學術研究為大工廠的觀點，動搖了19世紀各領域德國學者長期以信奉且親切懷抱的觀念：正確實踐的學術研究能實現“成長”。1917年，韋伯發表了演說《以學術為業》，^⑨這可看關於尼采對蒙森的批判，以及大人文作為理性化的、祛魅的知識的最高形式某種評注。對尼采等批評家而言，“以學術為工廠”代表了對“以學術培養成長”的最終、最徹底的疏離——材料（客觀的）對個人（主觀的）的威脅。韋伯把學術對個人意義的疏離同大學的“美國化”相聯系。但是蒙森、阿爾多夫和哈爾納克已經使學院——如果不是大學——變成了一座現代工廠，在其中，工人與生產方式隔離，少數明星學者的功能如同知識工廠的經理。

六、數字時代的人文學科和知識的未來

尼采與蒙森，意味著大科學對小科學、合作對獨自研究、編纂對闡釋、檔案收集對理論思考、重組訓練對道德轉化，這些都是認識論、倫理乃至道德的區別。尼采和巴霍芬指控蒙森發動了對科學的機械化，宣稱他缺乏對古代應有的尊崇。現代語文學既是古代祛魅的媒介，也是其無意的結果。語文學是19世紀德國最完善的學科，其命運代表了更廣泛意義上的科學和人文學科。

對某些當代評論家來說，數字人文很可能是大人文學科悠久歷史的頂峰。數字時代的人文學科正被實證主義的幽靈纏繞，文學學者尤其明顯地表達了對實證主義轉向的焦慮和對“遠讀”的恐懼。但是，對實證主義的控訴的歷史幾乎無法與彙編實踐的歷史分開。在語文學語境裡，蒙森從沒說過闡釋並不需要——或事實能為自己說話，他只是認為檔案的收集可以部分地繼續，與其闡釋區別開。在蒙森看來，檔案材料的好處在於“可與理論保持中立”，並無人為意向。^⑩當他求助於古代羅馬銘文的實物性質，如其石質存在的沉重、永久和可定位性等，他祈求的是現代事實資料的頑固及其設想中的能力，即克制主觀的闡釋、推測和意向。這些事實並非僅僅為了眼前的目的，也是為了吸引超越自身的學者，促成與異域思想和文化的交融，實現被尼采看作語文學核心任務的“比較”。有人認為當代的數據實踐是史無前例的，這就忽略了這樣的模型、實踐和理論的歷史，並模糊了這個事實：數據無法自己說話，它總是被收集、組織、編輯，成為可獲得之物並被賦予意義。如蒙森所說，彙編與闡釋並不同，它們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活動。

19世紀後期開始的關於人文主義探索、尤其是語文學的爭論，從未塵埃落定。人文學科以無數形式繁榮發展，而且是在不斷應用新方法、實踐和技術的同時實現的。不管數字人文或計算人文還是別的什麼，就像廣義的人文學科一樣多元，不能簡化為文本挖掘或“遠程”閱讀。數字人文包含的工作、方法和目的多到令人頭暈，弗朗哥·莫雷蒂及其“遠讀”只是一個例子。不過，也不能以方法論的不拘一格為藉口，忽視面對新證據和材料時實踐活動的無力和局限。

儘管人文主義學科或人文學科不限於某種方法或證據觀念，但也有共同的傾向，即執著於培育和從事奧古斯特·伯克所說的“關於現在和曾經瞭解的知識”。^⑪蒙森或尼采都不懷疑語文學的前景，他們所爭論的只是最佳的實施方式和目標。蒙森主張“大學術研究”，尼采要將語文學再發明為譜系學，他們都致力於細緻嚴格地培養和考慮“傳統”，也就是時間流逝後文本和文化的傳播和編纂。兩人都認識到，沒有檔案，就沒什麼可闡釋，沒有材料可賦予其意義。

我們的檔案正逐漸從印刷轉為電子檔案，傑羅姆·麥甘和伯達尼·諾維斯基說我們“正面對

我們多樣而共同的文化遺產被大量、幾乎是全部轉化”。^⑩參照蒙森來考慮當代的努力，有助於我們看到，不論是銘文收集還是數據庫，創建檔案從來都不只是堆積事實。^⑪收集、組織、過濾，對檔案的創建和傳統的維護不可分割，並依賴於獨特而有著自身歷史的實踐、工具和技術。當人文學者再次反思收集和闡釋資料之間的區別時，最好能記住，我們就處於爭論此類問題的傳統之中。

“大人文”的較長的歷史能幫我們理解，規模和方法上的變化，在歷史上就總是包含人文學者實際上如何做學術研究、如何與研究工作發生聯繫等方面的最基本方式的變化。並非每個人都會闡釋數據或者構建宏大的由資金驅動的思想，有些學者或研究助理只會收集數據並在管理者設計的基礎上對其編碼。許多以數字人文學者自居的人讚美合作性的學術研究，認為那是絕對的好事，但大人文學科項目的歷史表明，合作性或集體勞作也可能有負面後果，例如特別的等級制度。

我們還要考慮到，資金需求可能要求大人文對於行政程序更清晰可見。這些行政範疇的要求和規則如何塑造學者所提問題和所做工作的種類？包括人文學科在內的所有知識實踐都能用以各種目的，如果以為某種形式的人文主義探索（例如孤獨的、闡釋類型的）是純潔的，而其他的（例如合作的、數字的）不純潔，就失之天真了。

最後，大人文學科的歷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關於方法的頑固爭論也是關於當代學者人格和知識倫理的爭論。學術研究的目的是否僅僅是新知識、倫理轉化，或二者皆有？蒙森和尼采的論點，關於如何及為何從事人文主義探索是一個寬譜的兩端，只取一端會限制人文學科能帶來的好處。回顧人文學科的悠久歷史，對我們最的啟發就在於，它們總是那麼複雜多樣。

①David Armitage and Jo Guldi,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關於科恩和曼德勒的評論及阿米蒂奇和古爾迪的回復，參見*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2 (2015), pp.527-554。

③Matthew L. Jockers, *Macroanalysis: Digital Methods and Literary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pp.3-4, 5-6.

④Adam Kirsch, “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English Departments: The False Promis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 *New Republic*, 2 May 2014.

⑤Lorrain Dast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chive,” *Osiris*, 27/1 (2012), pp.156-187.

⑥Chad Wellmon, “Touching Books: Diderot, Novalis and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Future,” *Representations*, 114/1 (2011), pp. 65-102.

⑦④⑦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Max Weber: Schriften 1894-1922*, ed. Dirk Kaesler, Stuttgart:Kröner 2002,pp. 474-511.譯文引自馮克利：《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23頁。

⑧Lothar Wickert, ed., *Briefwechsel: Theodor Mommsen*,

Otto Jahn,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5.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Harnack, *Geschichte*, 1900, p.901,906-908,908,671,671,377,669,658-659,659,982,1004,1006,983,234,1003.

⑩⑪Theodor Mommsen, *Tagebuch der französischitalienischen Reise 1844/45*, Frankfurt, 1976.

⑬⑭Otto Hirschfeld, *Gedächtniss Rede auf Theodor Mommsen*, Berlin, 1904, p.16.

⑭⑮Christian Emden,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7.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Theodor Mommsen, *Tagebuch der französischitalienischen Reise 1844/45*, p.225,230,230,239,227.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Theodor Mommsen,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 1905, p.37, 38,37,199,459,37,36,44,160,209,197,69,160.

㉑㉒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Vollständige Ausgabe in acht Bänden*, vol. 1, Munich, 1976, p.30.

㉒㉓㉔Otto Seeck, “Zur Charakteristik Mommsens,” *Deutsche Rundschau* 118 ,1904, p.87,88.

- ③⑩ Lachmann, *Ueber die ursprüngliche Gestalt des Gedichts von den Nibelungen*, Berlin, 1816, p.163.
- ③⑪ Otto Hirschfeld, *Gedächtnisrede auf Theodor Mommsen*, Berlin, 1904, p.21.
- ③⑫ Sebastiano Timpanaro, *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 trans. Glenn W. Mo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88.
- ④⑬ Mommsen, "Ansprache am Leibnizschen Gedächtnistage (1895)," p.196.
- ④⑭ Lothar Wicker, ed., *Mommsen-Jahn Briefwechsel 1842-1868*, Frankfurt am Main, 1962, pp.25.
- ④⑮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49-55.
- ④⑯ 引自 Rebenich, *Mommsen und Harnack*, p.832.
- ④⑰⑱ Nowack, *Adolf Harnack als Zeitgenosse*, 2: p.1004, 58.
- ⑤⑲ Lionel Gossman, *Orpheus Philologicus: Bachofen versus Mommsen on the Study of Antiquity*, Philadelphia, 1983, pp.21-42.
- ⑤⑳ Fichte, *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Part I, vol. 3, in *J. G. Fichte 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ed. Reinhard Lauth, Hans Jacob, and Hans Gliwitsky, Stuttgart and Bad Canstatt, 1964, I, 3, p.55.
- ⑤㉑ 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Wilhelm Dilthey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1, Leipzig, 1922.
- ⑤㉒⑤③⑤④⑤⑦⑤⑧⑤⑨ Friedrich Nietzsche, "Encyc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in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rlesungsaufzeichnungen (SS 1870-SS 1871)*, ed. Fritz Bornmann and Mario Carpitell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3, p. 343, 343, 373, 344, 342, 392, 366-367.
- ⑥①⑥② Nietzsche,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rlesungsaufzeichnungen (WS 1871/72-WS 1874/75)*, ed. Fritz Bornmann and Mario Carpitell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5, pp.89-206.
- ⑥③ Friedrich Nietzsche, *Briefwechsel: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Part I, vol. 2, ed. 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1975, p.18.
- ⑥④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15 vols., ed. 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Munich, 1999, 1, pp.157-510; 8: pp.9-127.
- ⑥⑤ Chad Wellmon and Paul Reitter, "How a Philologist Became a Physician of Modernity: Nietzsche's Lectures on German Education," *Representations* 131/4 (2015), p.68-104.
- ⑥⑥⑥ Nietzsche, *Nachlaß 1869-1874*, in *Friedrich Nietzsch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7, p.613, 614.
- ⑥⑦ Nietzsche, "Notizen zu Wir Philologen," in *Friedrich Nietzsch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8, p.53.
- ⑥⑧ Nietzsche, *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pp.202-203.
- ⑥⑨ Stefan Rebenich, ed., *Theodor Mommsen und Friedrich Althoff: Briefwechsel 1882-1903*, Oldenbourg, 2012, p.693.
- ⑥⑩ Fritz Ringer, *Weber's Methodology*, Cambridge, MA, 1997, p.46.
- ⑥⑪ Fritz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Hannover, 1990, pp.253-258.
- ⑥⑫ Lorraine Daston, "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ritical Inquiry* 18, 1991, pp.93-124.
- ⑥⑬ August Boeckh, in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ed. E. Brautuschek Leipzig, 1877, p.10.
- ⑥⑭ Bethany Nowviskie, "Toward a New Deal," at <http://nowviskie.org/2013/new-deal/>; Jerome McGann, *New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MA, 2014, pp.1-3.
- ⑥⑮ Jerome McGann,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Critical Inquiry* 39/2 (2013), pp.327-346.

作者簡介：Chad Wellmon，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德語系副教授，博士。

譯者簡介：林太平，自由譯者，現居北京。

[責任編輯 桑 海]